

周德昌 编著

朱熹教育思想 述评

吉林教育出版社



Zhu Xi Jiao Yu Si Xiang Shu Ping

朱熹教育思想述评

周德昌 编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朱熹教育思想述评

周德昌 编著

责任编辑：元龙河

封面设计：姜 凡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875印张 48,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长春科技印刷厂

印数：1—1,487册

统一书号：7375·534 定价：1.15元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

陈惠冠 绘



朱熹在白鹿洞授徒

陈惠冠 绘



朱熹手书忠孝廉节碑拓片（碑今嵌讲堂）

水深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
以冬歲去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
極雪泥路漫泥行復幾程
雷分背玄悵悵不得由通唐
竹厚意不敢忘爲吳商聲

九道三年九月八日詩奉酬

敬夫贈言并以為別

新嘉坡朱熹書

朱熹手書《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詩碑

目 录

第一章 朱熹的学术渊源和教育活动.....	(1)
第一节 朱熹的学术渊源.....	(1)
第二节 朱熹的教育活动.....	(7)
第二章 朱熹论教育的目的任务和作用.....	(17)
第一节 论人性.....	(17)
第二节 存天理、灭人欲.....	(21)
第三节 培养“醇儒”.....	(26)
第四节 明人伦.....	(28)
第三章 学习阶段和教育内容.....	(32)
第一节 “小学”与“大学”的学习阶段.....	(32)
第二节 教育内容.....	(35)
第三节 《四书集注》和《童蒙须知》.....	(42)
第四章 教学的理论和方法.....	(54)
第一节 论教学过程.....	(54)
第二节 教学原则和读书方法.....	(64)
第三节 论治学和自学的方法.....	(78)
第五章 德育的理论和方法.....	(83)
第一节 德育的目的和任务.....	(83)
第二节 论德育过程.....	(91)
第三节 德育的原则和方法.....	(97)
结 语.....	(111)

第 一 章

朱熹的学术渊源和教育活动

第一节 朱熹的学术渊源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生于公元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死于公元1200年（宁宗庆元六年）。祖籍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极有影响的著名教育家。

朱熹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与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着的。

朱熹幼年时期，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朱松是二程的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和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同学。朱松用正统的二程思想教育朱熹，这对朱熹的思想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因而朱熹从小就埋头诵读儒家经典。八岁时读《孝经》，在书上写道：“不若是，非人也。”十岁左右读《孟子》。当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时，高兴之极，从此决意学做圣人。可见在幼年时期朱熹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学教育。

当朱熹十四岁时，朱松病死。朱松死前，把家事托咐给刘子

羽，并对朱熹说：

“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朱文公文集》卷九十）

朱熹遵从 亲遗嘱，从学于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人。二刘、胡三人都是信仰程学的理学家。所以，他们对朱熹的教育，主要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朱熹在这方面的回忆是很多的，如“某年十五、六，读《中庸》”，“某年十七、八岁，读《孟子》”，“初看子夏先传后卷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一〇四）等等。

但是，由于二刘、胡三人对佛学唯心主义也有强烈的兴趣，因而使朱熹也受到佛老的影响。朱熹在回忆他年轻时的学习经历时也曾提到这一点：“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词、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朱子语类》卷一〇四）“禅”指的是佛学，“老”指的是老、庄。可见年轻时代的朱熹，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是很广阔的，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好学精神。

公元1153年（绍兴二十三年），朱熹二十四岁，在赴任同安主簿时，至福建延平（今南平）见李侗，李侗曾和朱松一起受教于杨时的弟子罗从彦，也是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不赞成朱熹学佛学。对李侗的这种批评，开始朱熹是不愿接受的。朱熹说：

“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李侗）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延平答问》卷上《赵师复跋》）

朱熹在同安做官四年期间，反复思考李侗的言论，最后觉得有道理。公元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朱熹二十九岁，同安任满回崇安时，再次去延平见李侗，对李侗的一套学问逐渐感到兴趣。

公元1160年（绍兴三十年），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了表示诚敬，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李侗要朱熹只看“圣贤言语”，专心致志于儒学的学习和钻研。

朱熹对这段时期的学习情况有这样的记载：

“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指儒学）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此后，朱熹就着力于以儒学为主体来构造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但是，他并没有抛弃佛学，而是将它熔铸进去了。

李侗非常满意朱熹这个学生。他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李延平文集》卷一）后来的事实证明，朱熹不仅继承了他的学说，而且其水平也大大超过了他。

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思想体系，是以儒学为主体，并吸取佛、道思想建立起来的新儒学。朱熹新儒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既适应了南宋统治集团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也集中体现了魏晋以来儒佛道这些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历史过程中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结果。

朱熹恪守他的老师李侗的教诲，认为：“当今之世，欲成大事，惟有恪守孔孟教义，守道循理，专精致诚，舍三纲五常不能治国平天下，非正心诚意不能修身成大器。”（《朱子年谱考

略》)

朱熹又自称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程颢、程颐，并通过二程继承孔、孟道统的正传。他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大学章句序》）朱熹的理学思想不但直接继承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后代称之为程朱理学），而且也继承、吸收和综合了中国先秦以来各种唯心主义思想的重要观点，包括他所批评的佛教唯心主义在内。所以，他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首先，他的思想与孔丘的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他对孔丘是极为崇拜的。他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三）例如，在社会思想上，他强调孔丘学说中严格等级制度的正名主义，极力宣扬自汉代开始流行的加强封建权力的三纲思想。他说：

“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朱子语类》卷六八）

“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朱子语类》卷二四）

这就是说，君臣、父子等的尊卑关系或等级关系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凡是“以下犯上，以卑凌尊”，朱熹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朱熹这个思想实际上就是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又综合和发展了儒家典籍《大学》、《中庸》所代表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道德观和教育观。朱熹对这二篇著作是极为推崇的。他说：

“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

语类》卷十二)

朱熹为了继承和发扬孔儒之学，把孔孟学说的经典性著作集中编为《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精心加以注释。为此，他花费了一番心血。朱熹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反复修改《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临死前还在修改《大学章句》。他说：

“熹于《语》《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就。然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误，不住修削。”（《晦庵文集》卷五三）

朱熹的《四书集注》，抛开了汉儒注经的传统，重在义理，不重训诂，把孔孟的思想纳进了理学的轨道。所以，他的《四书集注》实际上是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宣扬他的理学体系——新儒学。

从朱熹的教育观来看也是这样。他亲手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一一详为列出，揭示学生。从这个《学规》中就可以看出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孔孟儒学是有密切关系的。

兹录《学规》原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朱熹所制的《学规》中所列的教育条目，条条都是出自儒家经典或儒家大师的语录。有些是来自《尚书》、《易》、《中庸》；有些就是孔丘、孟轲、董仲舒的言论和思想。由此可见，朱熹的理学（包括他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等），它的基础和本质是孔孟儒学，他的学说是孔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朱熹的理学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道学和佛学的影响。

朱熹本人以及他师仰的北宋二程都曾自述：“出于老释者几十岁”、“虽释老之学必究其归趣”。他们所指的“老”即老庄的道学，“释”即佛学。朱熹在哲学思想上，他吸收了道家“有生于无”的观点，发展成了系统的唯心主义思想。朱熹在表面上攻击佛教不遗余力，但他又吸取了佛教教义中某些思想补充自己。例如，他在阐明他的基本命题“理一分殊”时，就引用佛教禅宗的“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来说明“理”与万事万物的关系。从朱熹的教育观来看，他的“豁然贯通”说，虽然其前提是“积习既多”，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它受到佛教“顿悟”说的影响。他极力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宗旨，虽然是渊源于孔丘的“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教绳索，但他也吸收了佛教的禁欲主义精神。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朱熹主张“主敬”，朱熹说：“主一无适之谓敬”，它与佛教的“一心”、“住念”，“无慢怠”的意思是相通的。

朱熹理学最主要的特点是把儒学进一步哲理化，为巩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新的理论根据。它又吸取了道教、佛教思想，使之更加精致和细密。

第二节 朱熹的教育活动

朱熹十九岁时考取了进士，取得了最高的学衔。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学问，要进一步把精力用在钻研“义理”上面，直到它通晓透彻为止。他曾说：

“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以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原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胳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痛快。”（《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朱熹总结了他以前学习贪多嚼不烂的经验教训。二十岁以后，他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要求自己做学问务求融会贯通。有时为了搞透一段文字的“义理”，往往彻夜不寐。

嗣后五十年中，朱熹曾任福建同安主簿，知江西南康军，又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并知福建漳州、湖南潭州，先后凡五任，约计十四年。后又做过南宋宁宗（赵扩）的侍讲，计四十日。其余大部分时期，都是私人著述讲学，从事教育活动。就是从政做官期间，他每到一处，除了处理政事以外，经常提倡设立书院和州县地方学校，自己还参加讲学，同时对一般民众做些宣传“教化”的工作。可见，他对封建主义教育事业是十分热心的。

公元1153年（绍兴二十三年）朱熹二十四岁，出任福建同安县主簿。在宋代，主簿是协助县令管理簿书、赋税、教育等事务的官吏。朱熹对这一职务很尽责，经常查对赋税的出入簿册。每到税收时，先期贴出榜文，限期完纳。如果过期不交，就要严厉处罚。可见他是一个效力于宋王朝的忠实官吏。在这期间，他对同安县学进行了整顿。王懋竑编著的《朱子年谱》记载：

朱熹“秋七月至同安。……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

朱熹的所谓“修己”，指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所谓“治人”，指的是统治人民。他要生员学习的是“正心诚意”等一套儒。

与此同时，他整理和搜集藏书，成立“经史阁”，解决师生缺乏图书的困难。并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相互参考，绘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要学生们“朝夕观览”，以备祭礼时使用。（参见《朱子年谱》卷一上）

朱熹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对于同安县人民由于“贫不能聘”，而沿袭下来的“引伴为妻”的风俗习惯，认为是“乖违礼典，淩乱国章”要严加禁止。朱熹认为婚姻之礼，关系到“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从上面几件事中可以见到朱熹是如何的热衷于提倡儒学，维护封建礼教和纲常，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尽管是从政做官和在学术上有了一些基础，但朱熹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他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读书，一方面进行著述，务求在学问上有更多的长进。他在追忆他的老师李侗对自己的教导时，感到当时有些学理似懂非懂，自己学习不够深入透彻，十分羞愧。他说：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朱文公文集》卷四〇）

此后，他再多次研读《论语》、《孟子》，和理学家周敦

颐、二程和张载等人的著作。他曾说：

“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朱子年谱》卷二上）

“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朱子语类》卷四）

可见朱熹对儒家典籍和宋代理学家的著作确是用功很勤的。

朱熹在这个期间（1159—1177年）又编写了不少的著作，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程氏遗书》（1168年）。朱熹将二程门人所记见闻答问等审订整理而成。朱熹自称：“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朱文公文集》卷七五）

《资治通鉴纲目》（1172年）。是司马光所编的《资治通鉴》的节本。

《八朝名臣言行录》（1172年）。朱熹在《序》中说：“所载国朝（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

《太极图说解》、《通书解》（1173年）。它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解释。

《伊洛渊源录》（1173年）。把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以来的理学家，按照传授关系，排了一个理学的谱系。

《近思录》（1175年）。吕祖谦从浙江来到福建朱熹的“寒泉精舍”，和朱熹共同研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著作，选取语录六百二十二条，编为《近思录》，作为理学的入门书。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及《论语或问》、《孟子或问》（1177年）。他先编辑《论语集义》和《孟子集义》，按他的理学观点，取其“精粹”为《集注》，又把为什么这样取舍的

• • •